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

麻天祥著

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

[修订版]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

麻天祥著

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

[修订版]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麻天祥著. —修订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

名家学术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

ISBN 978-7-307-05266-6

I . 2… II . 麻… III . 佛教—研究—中国—20世纪 IV .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163 号

责任编辑：陶洪蕴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24.125 字数：347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266-6/B · 159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前记

今人尚八，尚六，古人尚三，尚四。故儒家举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勉而行之；老子有三宝，持而保之，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我常以此自勉。今拙著四种得武汉大学出版社垂顾，结集再版，而冠之以《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者，也是表明心迹而已：既有继绝学于往圣的立言之意，更有不敢为天下先的感戴之情。

俗话说，光阴似箭，自从我在近不惑之年，重新选择人生道路，走上这条充满太多幻想，朝乾夕惕而又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一晃便是 20 个年头。我始终记得，任继愈先生的教诲：聪明可以成事，但单靠聪明成不了大事，因而时时告诫自己，一只迟飞的鸟，即便不笨，也得不停地鼓动双翼，才能有所作为。20 年间，我视学术为生命，不敢有丝毫懈怠。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 16 种，20 余册。至今审视，虽抱缺憾，不敢宝瓦砾为珍奇，但也可稍慰平生，而不致有虚度年华的悔恨。武汉大学出版社，尤其是陈庆辉社长、王雅红主任，为繁荣学术，不懈努力，高屋建瓴，选取拙著《汤用彤评传》、《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20 世纪中国佛学问题》四种（原计划五种，《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去年 10 月已再版），结集发行。对此，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在我看来，《汤用彤评传》是治学的指导，《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是对中国佛学和禅宗思想的系统反思，《中国近代学术史》是学术研究主攻方向和理论基础，而《20 世纪中国佛学问题》和《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一样，则是我治学的入径之途。它们恰恰体现了我在 20 世纪学术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汤用彤评传》早在1993年出版，是继我的博士论文《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在台湾出版后的第三种学术著作。汤先生幼承庭训，早年留学哈佛，学贯中西印，任教北京大学，并被委以新中国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学术上主张同情理解、广搜精求、平情立言，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被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其为学为人，都是我生命追求的楷模。所以在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立即申请了一项省社科基金，并在南北辗转中，全力以赴，亦得同学之辅助，系统地梳理了汤用彤先生的生平、新人文主义，以及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研究。汤一介先生亦为之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以《国学大师丛书》在同一年内两次印刷，在学术界获得了好评，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所谓：有别于讣告式的传记题材，“写的十分优美动人，令人赞叹不已”的过誉。仅从这一点上讲，也可以说无愧师承。13年后的今天，此书能得以再版，也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无量功德。

《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是我在母校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7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是我刚到美国作访问学者时的事。其实，自步入学术界之后，我的研究重心多放在近代，于禅宗思想实在是基于对中国佛学的系统反思，对禅、禅学、禅宗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有自己的思考。禅宗以为，神宗思想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禅宗思想的兴起，基于《南华》，而承于道生、僧肇诸大德之后，是庄老的哲人之慧，而非僧人定心修身之法；宋以后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不是衰落，而是居高临下的全面渗透；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书着重论述禅宗思想在宋代以下同传统思想交相渗透的文化轨迹。但由于初版印数有限，发行面较窄，近十年来不断有人查问、求购，常欲再版而屡屡作罢。近日却如枯木逢春，将有多种版本面世。修订本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全部改写了近现代部分，增加了禅与基督教的对话，进一步彰显禅宗思想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对禅的现代诠释，力图全面展示禅宗思想全球化、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近代学术原本是我关注的焦点，涉及佛学、经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却对近代学术的辨析和总结，哪怕是只言片语的积累。《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出版虽然在2001年2月，但交稿却在我离湘之前。其内容集中在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学，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充分表现了“变”与“合”的特征。全书60余万言，涵盖了经学、子学、佛学、史学、文学，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后附近代学术年表，是首次系统展示中国近代学术的专著。《民国学案》的编撰也是由此导引出来的。然而，我深知，学术专著的出版是有些难度的，所以，虽宝瓦砾以自珍，却无意求助任何一家出版单位，这一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幸运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却不顾亏损，仅以印数700册面世。应当说这是校领导对我的特别关顾，当然也是我的学生的辅助让我实现了这一夙愿。特别是吴仰湘博士，在作皮锡瑞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同时，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和我谊兼师友的李清良博士，同样为本书作出了无私的贡献。这次结集，又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君子协定”慨允同时出版，尤其让我且惊且喜。原本以为无人问津的冷僻之作，如今却似宠儿备受青睐，更叫我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显然，《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不能算是原创，而是在《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的基础上的修订，是从“问题”的角度审视20世纪佛学及佛学研究的。问题涉及佛教的入世转向、佛教哲学研究及近代思想家对佛学的兼收并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科学分析，以及绝而复兴的唯识学研究，还有禅学、禅宗史的现代诠释。书后附有两篇论文，则是从理念和佛教未来发展上论述“问题”的。其实，辨析问题的核心正是出世、入世，时至今日的人生佛学的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显然以此为滥觞。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即使如以辨析有无，分析名相，排遣名相为重心的唯识学，也是要“从现实的革新处下手”（吕秋逸语），无处不有参与社会、直面惨淡人生的痕迹。修订本全部改写了第五章，新增佛学的继往开来第七章，力图使“问题”显得更为集中和圆满。

武汉大学出版社慧眼寻珠，拙作乃鱼目而附骥，以涉千里。惶恐之余，再致谢忱。

麻天祥

于 2006 年丹桂飘香之季（9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出世？入世！	1
一、晚清佛学伏流与 20 世纪佛学的二次革命	2
二、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向度	11
1. 宗教向度形成的心理素质及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	12
2. 人际关系方面的宗教向度——伦理观念	17
3. 社会关系方面的宗教向度——政治思想	21
4. 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宗教向度——哲学思想	24
三、近代佛学复兴的原因	26
1. 佛学勃兴的内在契机	26
2. 佛教勃兴的文化背景	34
第二章 佛教的入世转向	37
一、八指头陀的诗与思	38
1. 出世思想的形成和宗教向度的深化	43
2. 入世转向的蕴发和宗教观念的淡化	50
3. 禅诗中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57
二、太虚与佛教三大革命	61
1. 佛教的三大革命	66
2. 佛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78
三、弘一与导俗砭世的近代律学	83
1. 主要经历及思想发展的三个层次	83
2. 出家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	90
3. 佛学研究的特征	96



4. 佛学思想的人世转向	102
5. 通俗简易的布教方式	103
第三章 佛教哲学研究与思想体系的建立	105
一、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分析和佛教比较哲学研究	107
1. 佛教心理分析	107
2. 佛教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114
二、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	120
1. 真如本体论	121
2. 万法唯识论	128
3. 齐物观	133
4. 回真向俗的应用哲学	138
三、熊十力本心本体的新唯识论	143
1. 对法相万法唯识思想的扬弃	144
2. 本心本体	146
3. 禹辟成变的体用不二说	149
四、汤用彤的比较宗教学研究	152
1. 佛道思想比较看佛教的传入与佛道思想的调和	152
2. 佛玄思想比较看佛教发展及儒、道、释的互相趋附	159
3. 佛教各宗比较看佛法鼎盛与佛学中国化的内在契机	178
4. 佛教内外因素比较看佛法的渗透与其发展的休歇	192
第四章 唯识学研究	199
一、空、有二宗内在逻辑调适及法相宗之传衍	199
二、竟无法相唯识学诠	203
1. 法相唯识分宗说	203
2. 唯识抉择谈	208
3. 必要重复的简单结论	219
三、太虚科学唯识宗说	220
1. 哲学非佛法，佛法包哲学	222



2. 唯识通科学，科学近唯识	230
3. 唯物唯识唯生论	236
第五章 佛教与科学	241
一、王小徐佛学科学之比较研究	242
1. 以相对论解佛教时空观及离言说相	245
2. 依物理、生理学析佛法破执	247
3. 以“识”说鬼与灵魂	249
4. 以物质结构谈无常	249
5. 以科学之进步、更新，释佛法与科学之不合	250
二、尤智表的佛学科学分析	251
1. 形式：佛经结构严谨，文字组织规范，与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253
2. 方法：崇尚实验，佛学与科学亦相类	256
3. 内容：佛法是纯理智的产物	259
第六章 禅学与禅宗史研究	269
一、见仁见智的 20 世纪禅学研究	270
二、20 世纪禅宗研究之比较	275
1. 缘起之比较	279
2. 核心观念之比较	287
3. 方法之比较	296
4. 几个具体问题之比较	312
第七章 佛学的继往开来	324
一、多元与整合	325
二、趋向知解的多学科研究	332
附录一 理念与探索	
——答赵汝明先生问	338
附录二 佛教与 21 世纪	356



后记	376
重订书后	378

第一章 导论：出世？入世！

两千年前，佛学自印度传入中国，自汉及今，先后经历了初传、兴起、鼎盛、渗透以及复兴五个阶段。初传期与黄老之学、黄老之术牵合附益，采补道家思维与民间方术，而成佛道式佛教和佛道式佛学。魏晋南北朝玄风飙起，名僧与名士相契合，佛玄式佛教既丰富了玄学之思辨，也推进了佛典的传译及佛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隋唐两代 400 余年，上承佛学数百年传译之英华，融中印文化于一体，光大其学，演为宗派，形成了纯粹的中国佛学而问鼎世界学术之林。原初对外在佛祖和十万诸佛的崇拜，进至为对心内佛的追求，由外在的超越转向了内在的超越。这种由外向内超越的转换，实现了佛学在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向心性学说方面的发展。宋以下，禅风席卷天下，丛林制度之设虽致佛教残废而偏，佛学却向社会全面渗透，它重铸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陶冶了炎黄子孙的审美观念，佛学中心因此也就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清之季世，内忧外患，千古未有之变局，公羊学家乃至乾嘉遗老，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因而成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至 20 世纪，居士佛学以金陵刻经处为重镇，欲领袖群伦，佛门弟子亦步亦趋，以入世、救世相号召，高揭人生佛学之旗帜，力图重现六朝隋唐佛学之辉煌。这是由超越转向参与的第二次革命。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五个阶段及其在发展中由外向内的超越，由超越向参与转化的两次革命，展现了中国佛学兼融中印文化的历史长卷。

晚清佛学伏流与 20 世纪以出世为入世的佛学入世转向的第二次革命，则是文化现代转型中佛学问题的滥觞与核心。



一、晚清佛学伏流与20世纪佛学的二次革命

两汉之交，佛教东传，在中国经历了初传、兴起，至隋唐便在空、有二宗分野及专注心性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派系和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其在思想理论上，集数百年之英华，援儒道入佛，重点阐述心性问题。特别是禅宗，把心外佛变为心内佛，由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实现了中国佛学的第一次革命。宋元以降，佛教在经历了鼎盛之后转入了全面渗透的阶段，特别是禅宗直觉体悟、凝思寂虑等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恬澹幽隐、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了知识阶层，并渗透到整个社会心理，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这一时期，禅风虽然炽如烈火，禅家在理论上却无甚建树，“窄而深”的发展，反而把简易直捷的佛理推向神秘主义，机锋棒喝已遁入奇诡怪戾之途。尤其自百丈怀海创立禅院清规以来，尽洗僧人云游乞食，不事劳作之习，既强化了丛林组织形式，也以寺产奠定了佛门发展的经济基础。其“朝参暮请”之礼，“集众作务”的“普请”之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律己精神和自食其力的住寺原则，虽然承继了佛门戒律的传统，力图保持和合、民主、平等乃至超越精神，但寺产与宗门成固定的所有关系，追求精神解脱的佛家弟子难免为寺产所累，封建宗法关系便乘虚而入。寺院因此而成生利之所，僧人也就开始处运筹之境，登利禄之场了。显然，人世的中国佛教，尽管肯定了世间活动的价值，却不能不削弱伽蓝的超越和民主意识。于是，或超亡送死，与鬼为邻；或逃禅避祸，远离尘嚣。元明以下，寺僧多乏学力，佛教宗风衰颓，隋唐时代教理昌明之象已丧失殆尽，后世“破戒僧人”也就屡见不鲜了。但佛法全面渗透的结果却蔚成士子学人研习佛典之风，佛儒会通之势反而强化了佛学的入世转向和参与精神。

道咸以降，国势凌夷，知识阶层早已失去附庸风雅、浅斟低吟的宣政风流，更无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乾雄姿。年少气盛之士无不

疾首扼腕，倡言变法。然而固有之旧思想，寻章摘句，为六经之奴婢；传入之新思潮，来源浅薄，与传统心理格格而不相入，均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于此“学问饥荒”之时，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治中西、儒佛、新学旧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此而把佛学变成与当时社会思潮谐振的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原来追求内在超越的佛学一变而为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实现了佛学由出世转向入世的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晚清佛学是一支以经世为特征的通向未来的伏流，那么，它与近代社会思潮的结合，便是在现实社会中搅起滔天巨浪的理论源泉。

可以这样说，由超越变参与，由出世而入世的晚清佛学，是中国佛学在近代复兴的特殊形态，是继隋唐之后，佛学世俗化的主要阶段。佛学的双相二重否定，双向价值取向，^① 为晚清和 20 世纪佛学的涉世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反对科学却包孕科学；崇尚信仰又长于思辨；追求出世而又呼唤入世；否定理性却又在构建自己的玄理。晚清和 20 世纪佛学正是在上述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思辨与直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冲突中，实现其入世转向的。

梁启超有言曰：“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② 这支伏流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思辨、经世倡之于前，石埭、杨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③。居士佛学的兴起推动了 20 世纪佛

① 作者认为，佛教遁世思想是对社会人生的否定，同时又批判俗界而表现为入世精神是二重否定。它否定人性，追求佛性，再由佛性返归人性，它否定现世而趋于净土，再将净土置于现世，则为双相二重否定。它追求个人解脱、灰身灭志的绝世思想，又要点燃觉悟、普度众生的入世激情，便是其双向价值取向。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 5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全集》第 5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学的全面发展，杨仁山以下，不仅有以太虚为代表的“汉系”寺僧和以欧阳渐为首的“宁系”居士，而且诸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汤用彤等著名学者也都同金陵刻经处有关。

概而言之，近代社会思潮由学者、居士和寺僧佛学三个方面协力推波助澜、从经世致用和哲学思辨两条道路向前推进。寺僧重在卫教，居士意在弘法，思想学术界佛学的研究宗旨则在于利生。三者虽有不同，然而其参与精神不仅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而且也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并铺就了一条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

清末民初，整个社会的剧烈变革动摇了前此以往的思想观念和共同奉守的伦理生活。“姬孔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也不足以持世。”^①现实世界的没落为新思想清扫出一块诞生之地，社会革命也进一步要求哲学之革命。于是，学者们开始皓首穷经，以经学形式论证王治问题，转向辩证思维，以哲学形式探讨心性问题和经世理论。具有严密逻辑思辨性的佛教哲学，便成了他们首先选择的对象。前起龚自珍，中经谭嗣同、梁启超，继以章太炎、熊十力等，无不从佛学中撷取真如、心识、缘起，三性、四谛、六尘、八识诸如此类的范畴，并借助其思辨的方式，探求人的本质，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位置，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藉以实现认知过程的形式，由此建立起以人为本位，并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哲学体系。

这条道路发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至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而形成了20世纪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哲学革命。可以说，谭嗣同心本体论的多环状经世佛学逻辑结构→章太炎可以认知的真如本体论及围绕“识”自体展开的多重关系，半开放式的认识圆圈→熊十力无形无象，体用不二的本心本体论，是这一思辨之路的主线。而梁启超的佛教哲学及比较哲学研究，在这条主线中，不仅对佛教哲学有新的创见，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谭嗣同与龚自珍具有类似的思想特征。龚氏口不择言，动触时

^① 章太炎：《人无我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忌，是放荡不羁的才子；谭氏则是对国势有切肤之痛，对时政刻骨铭心憎恶的桀骜不驯的斗士。龚氏醉心仕途却落拓江湖，谭氏积极的参政意识和献身精神，最终使他血染菜市口。他的诗“画里移舟，鸥边就梦；镜中人影，衣上添香”实得龚氏浪漫主义风采之三昧。他大声疾呼要效法陈涉、杨玄感揭竿而起，拼九死以求一生，足见其革命性远在龚自珍之上，也远在魏源、康、梁诸君之上。所以，他的佛教哲学研究也无处不表现“不可一世之概”。虽然他着重论述了心本体的态势，以及心、心力、仁、以太、体用、道器等各种范畴的相互关系，但他那以平等为内涵的政治理想，以日新为宗旨的社会变革方针，以救世为准则，以勇敢无畏为精魂的自我奉献精神，始终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政治要求。因此又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称其为“经世佛学”。这是近代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为其后的章太炎、熊十力开拓出一条纯哲学思辨的径路。

章太炎的佛教哲学研究尽管也表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注意力同样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之上，但在他疾呼“种族革命”的同时，又惟恐哲理“将成广陵散耳”^①，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场哲学革命，以纯思辨的形式，构建起以人为本，包括本体论的确立，方法论的探究，以及应用哲学在内，兼顾名理和人事，既具有西方理性思辨内容，又具有东方哲学色彩的法相唯识哲学。他取佛家的真如（Tathatā 或 Bhutathata），与柏拉图的伊跌耶（idea）即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相比较，首先建立起他思想上的终极依托形式，即可以认知的真如本体论。章氏通过对佛学“三性”的探究，强调“在遍计所执之名言中，即无自性，离遍计所执之名言外，实有自性。是为圆成实性”。这一真实永恒的圆成实性，即“唯识实性”或称真如。它是自然而然，又可直接证得，是“一切事端之起”^②，

① 章太炎：《致潘景郑书》。

②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是不依任何事物，不受制于任何规律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所以是常，是实，是普遍和永恒，是大千世界万象万物的根本特性，因此被他奉作哲学上的本体。章太炎竭力把真如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区分开来，赋予真如本体更加具体的内容。阿赖耶识既有真如的本体功能，又有具体的内涵，所以，被作为真如的显现物，运用到其哲学体系中，建立起“以自识为宗”的“万法唯识论”。他通过对三性、四分、八识的繁琐论证，集中说明依他起性即依相应的识为条件而派生现象界；遍计所执性对此现象界进行分别，以是为客观实有而生妄见；圆成实性离名言所执，排除客观实有的妄见，体认一切唯有识性而得契合真如，才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这一认识的起点是自身的“识”，它的归宿，即认识对象也不过是“自识”所表现的心心诸法。它围绕自体形成了一个多重关系的圆。如果说，“真如本体论”是对佛学的改造和重建，“万法唯识论”是法相宗“唯识无境”说的直接演绎，那么，“齐物观”则是他以佛解庄的理论结晶。《齐物论释》便是这一结晶的拔萃之作。他对“齐物”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统一即齐物的普遍性这两条规律。“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便是对上述规律的纲领性解释。必须承认，章氏所持“唯识无境”和对立统一的认识方法，把一切差别泯灭在心识之中，固然表现了丰富的辩证思想，但这种病态的我向思维的最显著特征在于主观淹没客观，因此他最终虽然摆脱了他力图摆脱的虚无主义倾向，却陷入了相对主义的窠臼。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初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又表现出“求是”和“致用”的趋合心理，以补其哲学之不足。所谓“上契无生，下教十善”^①，正是这种趋合心理的产物，也是其应用哲学的参与形式，同样表现出佛学的涉世精神。

梁启超对佛学研究涉足甚广，但作为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哲学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及其在佛教史、佛教典籍研究方面的贡献。然而他毕竟还不同于康有为、蔡元培等，纯以佛学

^① 章太炎：《荊漢微言》，见《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1915年版。